

唐表元台话天中

□ 阚家森

观星台位于登封市东南15公里的告成镇北高地上。告成镇，古称阳城，春秋时代为郑邑，秦置县，武周时因封禅成功更名告成，五代唐时又复名阳城，周显德中并入登封县。是一处地上、地下历史文化遗存十分丰富的历史古城，尤其是1977年告成镇西北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，发掘清理出夏代初期的小城堡，更显示出这一带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观星台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建筑，而且也是世界上重要的天文古迹之一。此台为砖石结构，台体形似覆斗，台高9.46米，下部各边长16米余，上边8米余，四壁均有明显的收分，具有宋、元砖台建筑的时代特征。其北面设有东、西对称的登台踏道入口，可盘旋登临台顶。梯道及台顶周边均砌有1.05米高的梯栏和女儿墙。踏道四隅，设石龙头排水口。台顶北沿筑小室一列，为明嘉靖七年(1528年)侯泰增修。台体北立面中间砌一凹槽，槽的东、西两壁上下有收分，呈斜面墙壁，而南壁为上下垂直的砖壁，用以代替铜铸的“四丈高表”。而且巨大的台体，十分稳固。正因为高表测景的需要，才出现观星台特殊的建筑造型。凹槽下方，距直壁36厘米处，自南至北砌有石圭(又称“量天尺”)一座。由36方青石板平铺而成，下部为砖砌基座。石圭长31.196米，经测定，石圭正居子午方向。石圭上面刻有双股水道，用以圭面取平。这是我国元代初年天文学家郭守敬等为了改革历法，准确授时，而进行天文仪器改革的历史鉴证。郭守敬认为“历之本在于测验，而测验之器，莫先仪表”。为了得到精确观测日景的数据，把八尺之表，加高五倍，创制了四丈高表，又在表端加设“横梁”，并在石圭上加配利用针孔呈像原理制作的“景符”，用它接收太阳倒像和横梁投影，把测量精度大大提高。根据郭守敬、王恂等科学家的仪表改革，在全国二十七地进行规模空前的天文大地测验(“四海测验”)，以及周密的数学计算，元初天文历法改革取得了重大科技成果。郭守敬创造了10多项新的天文仪器以及制订出先进的《授时历》，均较前代有了很大创造性的进步。与《授时历》所测结果完全相同的今世界通用的阳历(格里高利历)，则晚于《授时历》300年左右。《授时历》是我国古代最好、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之一，不仅在我国长期使用，而且还东传到朝鲜和日本，他们或直接使用，或利用其原理方法，并进行实测，在《授时历》基础上，创制自己的新历。

观星台院内，既有我国长期使用的传统八尺圭表——“周公测景台”石表，又有郭守敬改革创造的四丈高表。从最早的土圭测景、八尺之表到配有横梁、景符的四丈高表，千百年来先人们在观测天象，探索科学，改革历法，服务农业、畜牧业生产等方面的不断进取精神，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从僧一行到郭守敬，一代又一代的天文学家都是那样的重视实践考察，都是那么重视吸取前人的宝贵经验，都是那样敢于改革创新，所以他们才能做出在中国及世界科技史上的光辉成就。他们的名字，也都被世界所公认，更重要的是，在他们科学实践的辉煌里程中，为中华民族不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，而且也为我们留下了光灿夺目的世界文化遗产——唐代周公测景台和元代观星台。它们已成为唐、元两代天文历法改革中保留下来的极其珍贵的实物例证。至今配上必要的设备，仍然可以模仿古制在台进行天文观测，著名现代天文学家张钰哲说：“观测，主要依靠观测，是天文学实验方法的基本特点。”唐表元台在历史长河中，既保存了完好的台体，又作为珍贵文物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特别是近年来，在观星台台北部中轴线上，元代建筑遗址的发现，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元代观星台的完整面貌留下更大的期望。唐表元台、两座不同时代的天文建筑保存在一起，这是世界上罕见的奇迹之一，他们更是“天地之中”历史建筑群中唯一的一处用于科学技术观测的建筑。如果说“天地之中”是中岳嵩山顶峰的一顶宝冠，那么，告成观星台的唐表元台应当是这皇冠上两颗闪光的明珠!

嵩岳万木竞葱茏

□ 杨匡汉

赋予了张国臣以根性与诗性。这本诗集中的《嵩阳书院》《念奴娇·少林怀古》等作品，不仅描绘了嵩山雄险神秀的自然风物，还诗意地演绎了嵩山所承载的中国五千年来的人文地脉、思想文化。进入他的诗词，仿佛走进了一个开放的地质、宗教、武术、科技、建筑艺术的博物馆。而且，张国臣向我们展示的，还是一个不断变化、发展中的嵩山。特别是诗人注视嵩山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，结合自己的心路历程，对时代的发展和人生的进步、精神的振厉和境界的升华，都剑胆琴心地作了很好的记录与呈示。

论及当今的中国诗歌，人们往往以新诗为主要着眼点。新诗运动已近百年，其厥绩至伟，在于为新文化进入现代世界提供了精神的与传媒的通畅管道，然而同时也以与传统文化和诗歌典章的脱节为沉重代价。看得出来，张国臣是一位不薄新诗爱旧诗的歌者。他不薄“新”，而是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新思想的流贯，新生活的注入，新语言的充实；他又爱“旧”，在自己的歌吟中始终恪守诗言志、律和声、以旨趣为神采的理路。今人容易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，或者只是把两者视为历时性的关系。可喜的是，张国臣在诗词中将时间空间化，又将空间时间化了。他的几首步古人的诗词，如《春归嵩山·步李白韵》《归嵩山作·步王维韵》《嵩阳书院放歌·步白居易韵》等，不啻是古典的回响，是时空的穿越。李白送杨山人归嵩山，但见“长留一片月”，可谓嘤鸣雅会；张国臣续话沧桑，把追风岁月漫评量，看到的是“春来化冰雪”，那嵩山之太室山和少室山几遭

风雨，换了人间，更似长龙腾空。古人向山河取暖，今人向地脉取法，在倾听自然、感应宇宙、体察人生上，古今诗人异曲同工。也因此，我们有理由珍重时推格调而勿忘神韵，也确信古今相望足可磅礴而发高吟。

在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的文学生态环境里，对于运用旧体诗词写作的诗人来说，创新是应有之义，更是前沿话题。繁星数到三更鼓，布之为旧瓶装新酒。据河南诗歌界朋友介绍，张国臣自幼酷爱唐诗宋词，曾手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并勤于吟诵，心腑蕴高吟琴音。人到中年，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和对诗歌艺术研究的加深，他更揖接英贤，运用古体诗词的形式，并努力在此基础上进行创辟。他的《梦游嵩山吟留别》《留余》《少林竹》《清平乐·嵩泉》等诗词，无论是在思想的真纯上，珠玉的吐纳上，意境的营造上，还是在语言的运用上，均可看到诗人踞案沉思的匠心与泼墨。他循环古意，回旋于心，写的是当下生活，切近时代，切近民生，丹心滴血如霞；他遵守格律平仄，又敢于突破摹形仿势的束缚，许多辞章如天马行空，挥洒自如，唱叹弥日；他还移用当代口语入诗，新声独灿，启人心智。如此深探情本，真气盘旋，就不必以形式之新旧而论高下了。

“不來峻极游，何以小天下？”此诗此词已是世界文化遗产“天地之中”嵩山呈现给世人的名片。那么，我们同样期盼着，胸次浩茫者张国臣，能继续假嵩山以为风骨，织天机以为华章，获取走向诗世界的通行证。

人世纷纭，得雄奇者有几？嵩岳万木竞葱茏，新词妙制绕毫端!

“天亡簋”铭与“武王嵩山封禅说”

□ 顾万发

商朝末年，其时已是诸夷内侵，商王朝的东向敌区实际控制地域已不多。

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记载：“武乙衰敝，东夷盛，分迁淮谷，渐居中土”。《左传》昭公四年云：“商纣为黎之苑，东夷叛之”。《左传·昭公十一年》记载：“桀克有缙以丧其国，纣克东夷而陨其身”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武王伐商时，“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”。

武王伐商过程中的征伐及远服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亦记载：“文王受命，政不及泰山，武王克殷二年，天下未宁而崩”。

并据《逸周书·世俘解》记载，武王遂征四方，凡翦国九十有九国，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，俘人三亿有二百三十。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。既是说当时共讨伐了99国，向武王臣服的小国有652国。据多位学者研究，这些征伐可达河南东及东南，则当时诚服的小国距离更远。虽然当时很多国家是表面赞同的，像管叔、蔡叔及武庚叛乱时，曾有东方夷人势力徐、奄、蒲姑等17个方国参与起兵反周，又据《孟子·滕文公(下)》，周公近三年的东征，“灭国者五十”。

武王伐商之分封据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，伐商过程中，已“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”，并虑及“武王为殷初定未集”，“乃使其弟管叔鲜、蔡叔度相禄父治殷”。待武王“乃罢兵西归”，又“封诸侯，班赐宗彝，作《般》之器物”。武王追思先圣王，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，黄帝之后于祝，帝尧之后于蓟，帝舜之后于陈，大禹之后于杞。于是封功臣谋士，而师尚父为首封。封尚父于营丘，曰齐。封弟周公旦于曲阜，曰鲁。封召公奭于燕。封弟叔鲜于管，弟叔度于蔡。余各以次受封。”又《史记·周本纪》曰：“是时周

武王克殷，求太伯、仲雍之后，得周章。周章已君吴，因而封之。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，是为虞仲，列为诸侯”，又曰：“自太伯作吴，五世而武王克殷，封其后为二：其一虞，在中国；其一吴，在夷蛮。”由此可见当时武王的分封地理已及远至于商之东、南、北。

从有关祭祀及用语方面看何尊铭文云：“惟武王既克大邑商，则廷告于天，曰：‘余其宅兹中国，自兹义民。’”武王既克大邑商，则祀于天，居中国，显然是天子气概。

另从铭文本身内容看《天亡簋》铭文本身内容复杂，解释很多，但不管其他内容如何解释，对于“王祀于天室”、“不(丕)显考文王，事喜(饴)上帝”及“丕克中(或訖)衣(般)王祀”等内容，现在学术界意见较为统一，显然这些内容是天子之制度，只有天子才能有此礼仪。

总的可以发现，武王无论在伐纣准备、伐纣过程中及西归后，其始终是以一天子的姿态出现的，武王当时的势力范围或名义上的势力范围是在“四方”的，自然，按照古者圣王之制“祭不过望”的礼仪规范和原则，武王望祭时只能限定在其统治的势力范围内，显然能包括东、西、南、北这“四方”，否则是与古礼制、天子身份不符的。若此，则武王望祀，只能是“四方”，而非“三方”。当然《佚周书·度邑解》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中曾讲到武王所论之“三方”，不少学者曾把“王凡三方”与之关联，我们认为“天亡簋”铭不属于武王“度邑”、“定宅”之活动内容，“度邑”、“定宅”所谓三方地理山川，只是讲依天室之居的地理环境和风水，与《天亡簋》铭文所载的属于武王“大豊”之望祀的“王凡四方”不是一回事，即使度邑与“大豊”基本是处于同样的时间段。

“中”育中国

□ 牛玉乾

《中庸》记载：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”这一至理名言告诉我们，“达道”来自“大本”，“和”因“中”而生。那么，什么是“中”呢？

嵩山因居“天地之中”而神仙群聚，因居九州之中而万国来朝，因居华、泰、衡、恒四岳之中而被尊为中岳。这个理念，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王朝就有了，甚至在黄帝和尧、舜时代，也已形成了。

2002年，在虞舜帝都平阳的陶寺遗址，考古学者在一座距今4100年前的古墓里发掘出一把圭尺。圭尺是什么？就是用来测量日景的一个器具。据考证，商代以前，圭尺这一器具的名字就叫“中”。“中”就是圭尺。远在尧舜时代，先人们就使用“圭表”的器具和技术来测景观天了。

“中”作为一把量天测地的尺子，它首先被用于寻找“地中”。为什么要寻找“地中”？《周礼·大司徒》上说：“以土圭之法，测土深，正日景(影)，以求地中。”“日至(夏至日正午)之景，尺有五寸，谓之地中；天地之所合也，四时之所交也，风雨之所会也，阴阳之所和也。然则百物阜安，乃建王国焉。”这也正如《中庸》上讲的，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。这就是说，“地中”是最大和谐的所在。大和谐所在的标志，是天地间一年四季的风雨在这里际会、阴阳在这里交和。只有这大和谐的所在，才“百物阜安”，宜于建国立都，使“王者居中”，达到统领一切，调动一切，臣服各路诸侯，确保国泰民安。按照这套“地中”理论，王者应该独占地中，一人垄断与天帝沟通的宗教特权，像黄帝一样，与天帝单独“神会”，“独授天命”，“君权神授”。

那么，地中在哪里呢？“地中”的标志，就是用8尺长的圭表测景，每年夏至这天正午时分，只有太阳的影子长度为“一尺五寸”的地方，才是“地中”。

为什么表长必须8尺，测得太阳的影子又必须是一尺五寸呢？

因为不是这样的尺寸，就不是“天地之中”。“八尺表杆”就是帝王(人)的身高，“一尺五寸”则是臣民(人)的小腿长度。直立的“八尺表杆”，是天子的化身；而躺下的“一尺五寸”是“圭”，是臣民跪地小腿与地面相合的影像。寻求“地中”，就是天地、臣民之间的对话，是天子以臣民为“牺牲”祭祀上天上的行动。测景的庄严性物化为测景台，在周公所作的《周礼》中，进行了详尽的表述。

然而，每年夏至这天正午，圭表影长一尺五寸的地方，又在哪里呢？

从黄帝到大禹，他们踏遍九州大地，经过无数次实地测量，最后得出结论：每年夏至当日正午，影长一尺五寸的地方，就在嵩山的阳城。阳城就是“天地之中”。在中国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二地。